

德拉布尔《七姐妹》中的老年身体叙事

何文馨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5年9月29日；录用日期：2025年12月2日；发布日期：2025年12月12日

摘要

英国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 1939-)一生创作颇丰。在早中期的小说中以塑造青年与中年女性角色为主，到了后期，作家顺应英国老龄化的发展进程，以老年女性为主，探讨了与老年密切相关的话题。在文学老年学和身体叙事学的双重视角下探究德拉布尔于2002年出版的《七姐妹》，发现小说揭示了女性在步入老年后面临的孤独处境。在此基础上，小说从“身体”为切入点揭示衰老带来的身心挑战，并鼓励老年女性通过写作、重新建立人际关系、旅行等方式，完成自我的“死亡”与重生，重新构建起生命的意义。

关键词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七姐妹》，文学老年学，身体叙事

The Aging Body Narrative in Drabble's *The Seven Sisters*

Wenxin He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September 29, 2025; accepted: December 2,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12, 2025

Abstract

British writer Margaret Drabble (1939-) has produced a prolific body of work throughout her career. Her early and mid-career novels primarily focused on portraying young and middle-aged female characters. Later in her career, responding to Britain's aging demographic trends, she shifted her focus to elderly women, exploring themes closely tied to aging. Exploring her 2002 novel *The Seven Sisters* through the dual lenses of literary gerontology and body narratives reveals how the work exposes the loneliness women face upon entering old age. Given that, the novel examines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difficulties associated with aging by starting with the "body". It also encourages older

women to rethink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embrace their own “death” and rebirth through writing, reestablishing relationships, traveling, etc.

Keywords

Margaret Drabble, *The Seven Sisters*, Literary Gerontology, Body Narrative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年轻一代逐渐登上世界舞台的同时，老龄化的浪潮正以不可逆的速度席卷而来，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共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议题早在文学领域便得到了相应反映。学者安妮·怀亚特-布朗(Anne Wyatt-Brown)在其 1990 年发表的文章《文学老年学时代的到来》(“*The Coming of Age of Literary Gerontology*”)中提出了“文学老年学”(literary gerontology)这一术语。随后出现的“叙事老年学”(Narrative Gerontology)、“老年诗学”(Poetics of Aging)、“成熟小说”(Reifungsroman)等术语继续丰富了年龄研究的内涵。在第三版《诺顿理论与批评选》(2018)中，编者更是首次将“年龄研究”(Age Studies)纳入生物政治学的研究谱系，彰显了其研究价值。除此之外，在西方女性运动的浪潮中，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家，如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桑塔格(Susan Sontag)、格莱特(Margaret Gulle)等关注到了年龄与女性之间的联系，旨在批评老年女性可能面临的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在此背景下，表现老年女性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开始反思并书写女性衰老这一主题，如伍尔夫(Virginia Woolf)、莱辛(Doris Lessing)等，这类作家尤其注重对“身体”的书写与描摹，身体不仅是人衰老过程的载体，更成为表达老年群体生存体验、社会处境与内在精神世界的关键符号。在继承前人的书写传统下，当代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在漫长的创作生涯里，孜孜不倦地探讨女性的命运。这种探讨从青年女性到中年女性再到老年女性，从女性的个人生活到女性的社会功能逐步扩展开来。在她 2002 年出版的小说《七姐妹》¹(*The Seven Sisters*)中，德拉布尔将她的女主人公坎迪达·威尔顿(Candida Wilton)设定为一位因离异而在伦敦开启独居生活的老年女性，文中大篇幅描绘了主人公因衰老带来的身体体验，刻画了她从陷入困境到走向重生的心路历程。

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叙事分析与女性书写两个方面。《七姐妹》因其在叙事上具有鲜明的实验性特征，如不断变换叙事视角、采用元叙事策略并与神话产生互文效果等而成为学者研究关注的焦点。王桃花系统探讨了《七姐妹》的元小说叙事艺术，揭示了小说是如何通过“结构矛盾”、“不可靠叙述”和“文学戏仿”等一系列自我暴露的手法，不仅瓦解了叙事的真实性，更将形式实验与探讨女性现实困境的主题紧密结合[1]；吴丽娟则认为德拉布尔精心构建了一个层次丰富的虚构世界；这一世界不仅是情节的载体，更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坎迪达进入老年时矛盾的自我认知[2]。此外，在女性书写方面，杨莉馨认为小说将形式技巧与女性主体性的构建紧密结合，深化了小说的性别书写内涵，展现出了老年女性的挣扎与涅槃[3]；曾佑强运用布鲁克斯的身体叙事理论，指出文中老年女性关于衰老的身体体验深刻影响了人物的心理世界，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并最终引导了她们寻求精神解脱与自我蜕变[4]。虽然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

¹本文以小说 *The Seven Sisters* 为研究对象，行文均使用其直译名《七姐妹》。但文中所有关于该作品的中文引文，均出自林之鹤先生的译本《空床日记》，特此说明。

《七姐妹》中的老年书写以及小说中的身体叙事，但较少关注二者在文本中是如何交织与互动的。在《七姐妹》中，德拉布尔通过对于身体的关注来反思当今老年女性的生存境况，展现了老年女性从混沌走向新生的过程，并引出一个核心问题：在衰老不可逆的前提下，身体如何能突破自我封闭，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实现自我解放，从而构建起主体性？为回答此问题，本文将从文学老年学与身体叙事学的双重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作家是如何刻画身体在时空维度上的独特体验来为老年群体重塑自我价值提供指引。

2. 老年身体的困境：“我们处于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以“一切从身体出发”作为口号，提倡身心一体，颠覆了西方传统的身心二元对立观念，将身体纳入了哲学的研究视野之中。由此，许多理论家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波伏娃、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福柯(Michel Foucault)等都衍生出相应身体理论，同时身体也愈发成为文学创作和批评关注的焦点。在叙事学领域，学者丹尼尔·潘迪(Daniel Punday)最早提出“身体叙事学”(Corporeal Narratology)的概念。他认为“身体叙事学的关键在于：某些思考身体的方式如何塑造故事情节、人物、背景及其他叙事层面”^[5]，并且他强调“叙事不仅必须决定将何种身体囊括在内，还必须确定身体如何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包括其他人物身体以及周围的环境——叙事空间、物品和自然界”^[5]。身体在叙事中并非一个孤立静态的元素，而是通过与外部世界的持续互动来推动意义的生成。德拉布尔在英国老龄化的大时代背景下，从描写个体女性衰老的身体为切入点，呈现了其与不同的人物身体、空间、自然等的复杂互动关系，生动展现了老年女性是如何从被社会定义的客体转变为主动言说的主体。

在小说第一部分“她的日记”中，德拉布尔独具匠心地采取了日记体写作，坎迪达作为不可靠叙述者以第一人称撰写日记，再以第三人称为每篇日记加注标题，我们跟随着她的内心世界经历她的生活，得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步入老年所带来的变化。她在日记的开篇就坦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胆怯，羞耻是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词语”^[6]。身体活力的日渐衰退，使她陷入羞耻和窘迫的状态中，特别是当坎迪达意识到自己青春已逝时，她称自己“看上去像枯萎的玫瑰一样凋谢了，失去了活力。我的皮肤饱经风霜，有了皱纹，眼角上的皱纹对女人来说较之男人要严重得多。我的体重不算重，但是我的肌肉下垂，显得松弛”^[6]。坎迪达以内化了的社会审美标准来审视并否定自己衰老的身体，评价自己为“凋谢的枯萎玫瑰”。这种基于身体衰老的负面自我认知，直接外化为一种社会性退缩，导致她开始拒绝与外界沟通交流。虽然她非常想买在年轻人群体中时兴的索尼随身听，却羞于开口向别人询问购买渠道。在加入健身俱乐部后，她表明“我并没有为了与年轻人交往而加入健身俱乐部。我不指望她们的青春会感染我，让我能延年益寿。我不想投入长生不老泉中去，而愿投入这碧蓝的游泳池”^[6]。坎迪达主动切断与周遭人物的身体对话，陷入自我封闭当中。这是因为在讴歌青春的西方文化中，衰老的身体往往被赋予消极的文化意义，而“青少年的身体就成为人们梦想中的完美身体，因为它象征自由、无拘无束、可塑性和对自身的掌控”^[7]。在与年轻身体的对比之中，老年人落入他者化境遇，自然会因衰老形象而产生身体耻感，而将自己“隐身”起来。潘迪指出“身体与桌子、椅子等物体不同，因为它能对环境施加作用并作出反应”^[5]。然而，当社会所定义的衰老话语将老年女性隐形化、污名化，使她们被排斥在以生育价值、女人味和性魅力为标准的市场之外时，她们所能“施加的作用”在起初往往是消极的，即通过主动的自我封闭，来规避被进一步边缘化的痛苦。

此外，身体不仅处于时间维度，也处于空间维度之中。年龄批评家从老人人生的全过程中划分出第三年龄和第四年龄“老人”，“在当代社会里第三年龄基本上表现为退休后的生，因为人们自己觉得或者被社会认为‘老’的时候，从自己的工作环境中退出，从而进入公开明显的‘衰老’过程”^[8]。坎迪达在日记中也袒露自己对于衰老的看法“我们处于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依赖我们生活的人已经过

世或者已经成年”^[6]。在前半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坎迪达都专心于家庭事务，她需要扶持丈夫的事业并照顾自己的三个女儿，然而如今当她从母亲和妻子的传统角色里解放出来后，却在这时显得无所适从。在与丈夫离异后，年过六旬的她只身从英国的乡村萨福克搬到了大都市伦敦，当她在日记中回忆起在萨福克的生活时，难掩对其的喜爱。“在萨福克，我的头顶总有一片辽阔无垠的天际，周边是无限宽广的空间。那里有绿色和金色的原野，海滨浴场的草屋，条纹帆布椅子以及映照着蔚蓝天空的河口湾，那一湾河水涌向银色的大海，向远处铺展开去”^[6]，呈现出一幅美好的田园画卷，早在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就发现田园生活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许多益处，并且他建议“老年人在大自然中享受田园之乐”^[9]。在萨福克时，坎迪达乐于扮演大庄园贵妇人的角色，时而插花订帘，时而参加音乐会或举办宴会，始终保持着舒适的生活状态。而现在，坎迪达来到了伦敦，她的空间居所也从原先乔治时代的大房子变成了伦敦的一室户。坎迪达可以直接从公寓俯视伦敦的城市景观，“这里的天空与萨福克那一尘不染的天空有天壤之别，但也不总是如死灰般的。有时候，它放射出耀眼的光辉，有时又被那种仿佛被污染的晨光朝霞和落日余晖所笼罩，散发出不祥的橙色、黄色、紫色和血红色的光”^[6]。在如此强烈的对比下，可以说伦敦并不满足老年人理想中的身心栖息之所，困在伦敦的一小方天地里，坎迪达靠在电脑上玩单人纸牌游戏打磨时光，尽管“它们诱人犯罪”^[6]。从“大庄园的贵妇人”变成了落寞的单身老妇。居住在狭小逼仄的公寓里，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老年人“异化”的生存空间和压抑的心理空间，她的身体活动被极大地限制，诠释了身体叙事学中空间对人物活动的塑造与限制作用^[5]。但坎迪达依旧从黑暗中看到希望，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陷入灰暗阴郁的伦敦天空中。这样更好。这个困境便是我的自由。在这里我将对我的肉体和灵魂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6]站在人生新起点的她拥有了更多自主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但衰老所引发的身心挑战，促使着她必须重塑自己的人生价值。

3. 老年身体的重生：“在我死去之前，我一定要学会成长”

克里斯蒂娜·鲍德温(Christina Baldwin)在《故事捕手：透过故事的力量与实践解读生命真谛》中写道：“每个人出生时像一张白纸，离世时则如一本写满故事的书。”^[10]在小说中，坎迪达通过文字述说着自己的生活经历：美好的少女时光、与朋友的点滴往事、琐碎的家庭生活，以及暮年阶段的生命感悟。以日记重组自己的过去，展示现当下的生活状态，吐露着自己的心声，书写着自己的人生故事，使得“文本内的虚构世界与文本外的现实世界相互映射、相互表征”^[2]。这与老年叙事学提倡的观点不谋而合，即通过写自传、讲故事、写日记等方式参与到艺术创作中来，以达到重构生命故事的目的^[11]。通过构建文本空间，坎迪达突破了物理空间对她身体活动的束缚，将生命体验转化为叙事，从而在符号层面重构了自己的主体性。在第一部分的日记体写作结束后，第二部分的“意大利之旅”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角，记录了她们一行七人在意大利的旅行经历，在这部分的开头就宣称坎迪达“一个一直需要被人保护的女性，仿佛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只过了几个星期，她便不再是那么温顺的一个人了”^[6]。从日记体的“自我言说”到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这一转换赋予叙事一种不容置疑的客观性与权威性，让读者相信坎迪达真的完成了蜕变。

事实上，坎迪达的转变是在她有如神助般从保险公司获得了一张十二万英镑的支票后开始的，有了经济上的支持，她聚集了自己的老友以及之前在维吉尔阅读班的同学们一起踏上了奔赴意大利的旅程，姐妹七人恰好与小说标题《七姐妹》形成呼应，斯托弗(Nora Foster Stovel)就曾在研究德拉布尔的象征主义艺术时指出“德拉布尔每部小说都围绕一个主导象征展开，通过精妙的意象模式呈现作品主旨。并将核心象征直接用作小说标题”^[12]。如今七姐妹们的人生经历与希腊神话“七姐妹星”²的故事遥相呼应，

²传说七姐妹分别为阿特拉斯(Atlas)的七个女儿：迈亚(Maia)、伊莱克特拉(Electra)、塞拉伊诺(Celaeno)、泰来塔(Taygeta)、梅罗普(Merope)、亚克安娜(Alcyone)和斯泰罗普(Sterope)。后来，猎户俄里翁(Orion)爱上了七姐妹并向她们展开追求。宙斯(Zeus)为了保

她们在与男性相处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伤害。女主人公坎迪达一直作为丈夫的陪衬存在“我就像一位老式的妻子，或是一位牧师的妻子。一旦哪儿需要我了，我就会出现在哪儿”^[6]。她的身体被禁锢在家庭的私人空间里，照顾丈夫与孩子仿佛就是她的天职所在。此外，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空间中，女性也经常沦为遭受身体暴力的对象，她中学时期的好友珍妮特·米尔格朗是一个饱受折磨的妻子，“她嫁了个嗜酒如命并死于酗酒的农民”，“她的丈夫劳作过，也毒打过她，后来死了”^[6]。另一位好友朱莉娅在和坎迪达叙旧时谈到婚姻时也这样说“这么多年来，那些男人是怎样在生理和心理上来虐待她——他们是怎样花掉她的钱，摧残她的身体，滥用她的耐心，糟蹋她的财产”^[6]。现在，众姐妹告别各自的生活状态，结伴踏上意大利朝圣之旅，期待在旅行中找到全新的自我。老年叙事学研究者指出“我们所珍视的每段友谊——其本身即是一场持续展开的对话——都在构建独特的叙事语境……催生出独属‘我们’的叙事共同体”^[13]。女性们在交往过程中无法从男性那里获得情感支持而陷入孤独的生活状态，导致她们倾向寻找其他女性友人来倾诉心声，通过交流互动，将各自的个体身体体验汇聚融合，逐渐形成一种短暂的、共享的“女性社群身体”，并凭借共享经历共同创造了新的故事。她们一同搭乘“萨拉姆博”号飞机，穿越雷暴与颠簸的气流层，向迦太基进发，大气层里依然有雷电霹雳。“坎迪达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头脑嗡嗡作响，像休克疗法，这对她有益。她感到整个人前所未有的清醒，并且精神焕发。”^[6]这穿越雷暴的旅程，就像是命运对她的一次特殊洗礼，让她从混沌中觉醒，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去迎接那未知却又充满魅力的彼岸。在白天的旅途中，她们穿梭于各个景点之间，夜晚又聚在一起阅读维吉尔、打桥牌，身处异域的空间，坎迪达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她已经逃脱了那种单调生活，逃脱了那种黑暗命运。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已经由死亡走向新生。”^[6]拥有了思想与身体的自由，坎迪达整个人都焕然一新，老友朱莉娅评价道“我没跟你说，你现在看上去比我第一次在伦敦见到你时样子要好多了，那时候，你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6]。置身于七人社群的互动网络中，坎迪达打破了此前在伦敦被衰老话语与狭小空间所规训的封闭状态，她的身体在异域的公共空间中变得从容，声音在集体对话中变得清晰可辨。

旅行并非一帆风顺，不久便传来辛西娅的丈夫巴克利先生在英国受到袭击的消息，与此同时坎迪达也接到前夫安德鲁的电话，告知他们的女儿埃伦因为要做腿部手术而住进了医院。一直惧怕与女儿联系的坎迪达最终在朋辈们的鼓励下打通了电话，母女俩也有了一次非常自然愉快的对话，这也让坎迪达意识到母女间的隔阂都是自己主观臆断的，应该站在女儿的视角去看待她们的关系。因此，在第二部分“意大利之旅”结束后，来到了第三部分“埃伦的说法”。坎迪达借助女儿埃伦的口吻来审视自己的人生并用文字为自己完成了一次“死亡”，“到目前为止，我和你所读到的故事，是在我母亲神秘莫测的猝死之后，从她的手提电脑上发现的”^[6]。在这个部分中，埃伦成为了坎迪达的读者，坎迪达通过想象女儿对自己身体的缺席所做出的反应，重构了自身与社会的联结方式。埃伦作为读者的质疑与修正，恰恰是坎迪达所期待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对话，这不仅缓解了她对死亡的恐惧，更让她以旁观者的视角获得了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细节的机会。但在最后一部分“尾声”中，叙事视角又回到了坎迪达的第一人称视角，坎迪达心想“在我死去之前，我一定要学会成长”^[6]。她开始主动缓解和女儿之间的关系，阅读女儿的论文并接受了前往芬兰参加女儿婚礼的邀请。“即使这一行为会让她与她那怒气冲冲的女儿马莎碰面。”^[6]事实上，玛莎与她之间并没有芥蒂，在婚礼上她甚至鼓励坎迪达去与男性约会。回到伦敦之后，坎迪达继续着充实的行程，现在的她学会主动与人交往，与之前的好友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并约定好了下一次旅行，一切事物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在人生的第三阶段，坎迪达逐渐走出封闭自我，学会与年老的自己相处并且向着未来继续前进，在本该成为定数的年龄，坎迪达却觉得一切都充满了未知与变数，小说

护七姐妹将她们变成了鸽子，让她们飞升上天成为星星。然而，在升天之前，其中一个姐妹梅罗普(Merope)下凡嫁给了西西弗斯(Sisyphus)国王。当众神判他永滚巨石时，她为他感到羞愧，因而从夜空中消失了。

的结尾就是这一心声的最好证明，“我充满了期待。那召唤我的又是什么呢？伸出你的手来吧，我说，伸出你的手来吧”^[6]。

4. 结语

面对衰老这一无法避免的人生课题，德拉布尔在《七姐妹》中对老年女性的生活处境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并勾勒出她们从陷入困境到走向重生的成长轨迹，从她的书写可见其对老年群体的人文关怀。本文通过身体叙事学和文学老年学的双重视角，聚焦主人公坎迪达的衰老身体如何从自我封闭走向开放互动。其中，基于共同生命经历构建的女性社群，为应对现代社会老年人的孤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乌托邦蓝图。这一社群的意义不在于对抗生理的衰老，而在于成员们在彼此的交往与互动中，持续地共同创作着关于衰老的新叙事。

参考文献

- [1] 王桃花. 论德拉布尔《七姐妹》的元小说叙事策略[J]. 国外文学, 2015(4): 91-99+155-156.
- [2] 吴丽娟. 《七姐妹》中的虚构世界和自我叙事真相[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46(2): 145-152.
- [3] 杨莉馨. 玛·德拉布尔《七姐妹》的性别叙事策略[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4, 26(5): 64-69.
- [4] 曾佑强.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七姐妹》中的“身体”解读[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4, 23(11): 72-74.
- [5] Punday, D. (2003) *Narrativ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Narratology*. Palgrave Macmillan.
- [6]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空床日记[M]. 林之鹤, 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8.
- [7] 帕斯卡尔·迪雷, 佩吉·鲁塞尔. 身体及其社会学[M]. 马锐,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 [8] 邓天中. 当代英语小说中老年叙事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9] 西塞罗. 论老年 论友谊 论责任[M]. 徐奕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10] Baldwin, C. (2007) *Storycatcher: Making Sense of Our Lives through the Power and Practice of Story*. New World Library.
- [11] Bohlmeijer, E. and Westerhof, G. (2010) Reminiscence Interventions: Bringing Narrative Gerontology into Practice. In: Kenyon, G., Bohlmeijer, E. and William, R., *Storying Later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75.
- [12] Stovel, N.F. (1989) Margaret Drabble: Symbolic Moralist. Starmont House.
- [13] Randall, W.L. and McKim, E. (2008) *Reading Our Lives: The Poetics of Growing O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